

■ 学人素描

阿德尔曼：均等化增长要以平等为目标



◎ 史昱展

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是这样一位具有自己特点的女经济学家。她更关注发展、公正、平等、贫困等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更能体现人文关怀。

1930年出生的阿德尔曼是个才女。19岁时即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教授。

阿德尔曼早期致力于经济周期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她与合作者对美国经济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实证研究,将商业周期作为随机冲击的反应来进行分析。随后该“冲击-传导”理论框架逐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之一。1973年,她与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奠定了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阿德尔曼,也逐渐成为新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均等化增长”有助于消除贫困

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著述中,阿德尔曼最早把发展目标界定为“消除贫困”。

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

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她明确地提出,“均等化增长”有助于消除贫困。阿德尔曼首先区分了“平等”、“增长”、“均等化增长”和“消除贫困”这四个概念。其中,“平等”、“增长”和“消除贫困”这三者都是“均等化增长”的特例。

“平等”居于一个极端,在“增长”起辅助作用的前提下,如果仅仅把“平等”视为一个目标,实际上就意味着“正义”和“公平”才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而“绝对福利”却不是。如果是仅仅把“增长”视为一个目标,那么,

阿德尔曼是一位更关注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更多体现人文关怀的女性经济学家。

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均等化增长”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经济增长应当成为减少或消除贫困化(或改善穷人收入)的工具,但“消除贫困化”要求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其中,政府的经济政策对改进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

由此,也为她赢得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目前,阿德尔曼已逐渐成为新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这个目标则居于另一个极端。她主张用发展的目标来取代“自我持续增长”的目标,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增长”才会被看作是减少贫困的工具。

如同“均等化增长”一样,“消除贫困化”涉及“平等”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的加权组合。“消除贫困化”意味着不仅要消除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还要消除以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贫困化;“消除贫困化”不仅涉及平等问题,还涉及需要创造有助于平等不断发展的诸多条件。因此,“消除贫困化”要求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动态制度变迁过程。

阿德尔曼发现,那些实行市场经济并同时实现了加速经济增长和改进穷人收入状况双重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如以色列、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基本上都遵循着一条极为相似的动态的战略序列:

第一阶段,实行激进的资产再分配,分配的重点放在土地的再分配上,同时对金融资本的使用和进一步的积累施加最低限度的限制。这一阶段也许是负增长率的时期,但对于确立起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制度条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人力资本积累的时期,积累的数量远远超过当前对技术的需求。这一阶段内,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被重新配置,人力资源基数在增大,在为下一阶段孕育了经济机会的同时,还增加了政治压力。

第三阶段是人力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的阶段。当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完成之后,要想继续推行“消除贫困化”战略,需要通过推行劳动密集型增长战略来提升后续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小国经济须向出口导向引导;而大国,工业化应更侧重于满足国内需求。

阿德尔曼指出,对于“消除贫困化”来说,两种极端的发展战略在理论上都有可能成立:要么一开始就促进经济增长,到后来再进行收入再分配并推进教育;要么一开始就进行收入或资产的再分配并推进教育,以后再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更快地消除贫困化,她力主广泛而审慎地运用“再分配和教育居先”的战略,这是因为当作为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先决条件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过去之后,将迅速推进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地

与适度同步的农业发展相结合,是使再分配资产的经济价值完全实现乃至真正地消除贫困化的关键所在。

阿德尔曼在具体地分析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的战略时,将韩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实例来剖析,这集中地反映了在1977年她和罗宾逊合著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韩国案例研究》中。

他们从对韩国的分析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察结果:第一,规模收入分配的时间路径具有显著的稳定性;第二,不同的收入接受者的行为对于政策干预的反应是极其敏感的。由此出发,可以认为,在无需过多地增加平等的前提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成了一种对不同职业和社会各阶层中贫困(及财富)的分布范围进行重新组合的极为强有力的工具。

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观察结果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工资份额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分配更为均等,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中贫困的分布范围缩小了;第二,由于社会经济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极为重要,因此,从政治角度考虑,政府处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能力更为重要;第三,如果在反贫困方面不付出巨大努力,使之比发展中国家通常所考虑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的话,则在平等方面以及在缩小贫困的分布范围和降低贫困的程度方面,就不会有显著的改进;第四,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于政策干预尤为敏感,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动乱。

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在韩国,大多数反贫困计划最终使富人和中等收入阶层所得到的利益多于穷人(尽管设计该计划的目的,不仅在于使该计划的初始影响非常特定地有利于低收入阶层,而且还在于使它的执行过程中不存在贪污、腐败、资金挪用他用等问题),他们由此得出了使收入分配恶化要比使收入分配改进容易得多的结论。

修正“库兹涅茨曲线”:改善不平等收入取决于政策选择

在半个世纪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基于对美、英、德等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著

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这一发现引起了许多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以此为论据,用以证明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必须经历而又不需过分担心的事情,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地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或者说,效率最终会带来公平;另一些经济学家则通过理论或实证分析对所谓“库兹涅茨现象”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阿德尔曼及其合作者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趋向进行了探讨,他们证明了,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上,确实没有显示出收入分配自动改进的趋向。他们对43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库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欠发达国家在发展起步阶段都经历了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6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充分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设,而是证实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倒J曲线”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归于穷人的收入份额起初急速下降,然后下降

得不那么迅速,再然后取决于所选择的政策,曲线不是趋向于拉平(倒J形),就是在起步时便呈递增趋势(正U形)。

对此,阿德尔曼从政治上作出了解释:当本国中产阶级状况得以改进和城市化得以推进时,对非上层集团的政策影响开始向中产阶级以及现代部门中的工人们延伸,但是,即使这些集团政治参与的程度更大也并不会增进穷人的利益。穷人收入状况的改进并不是自动地实现的,只有当政府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时,并且只有当各方面付出了广泛的努力来改进人力资源基数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口中最贫穷的部分才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

她还指出,传统的政策工具有一个弱点,即它们对归于穷人的相对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影响,最多也只能产生不规则的效应。她估计,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相对来说最不发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政策选择决定着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能否得以改善。

她的结论是:在客观上存在着“倒U曲线”,但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变的后期阶段上,不平等趋向是否下降,或者说曲线是否呈“倒U”形状,则取决于各国政府实行的有关政策。

■ 本期人物话语



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

保尔森(美国财政部长)11月9日称,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自有其道理,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拥有很高的经济透明度、劳动生产率高、经济政策稳定。目前金融市场动荡不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实力、开放性和竞争力,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

■ 多声道

中国金融机构正面临海外投资历史性机会

加里·帕尔(华尔街投资银行家)11月1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就国际投资而言,中国的银行和保险机构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机会。目前美国金融行业面临困境,次级债危机削弱了很多金融机构实力,而中国金融机构正处在兴盛时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进行海外投资及相关合作。另外,未来几年,将有很多中国企业在欧洲、美国投资,这些企业需要有一个广阔的全球视角,可以从优秀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少数股份开始,而不是百分之百的收购。这是一种很好的规模扩张、业务增长、学习先进经验与专业技术的方式。

金融创新要迈三道槛

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近日在2007年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我国银行业已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的承诺,外资法人银行已在国民待遇的条件下与中资银行进行全面竞争。市场的整个竞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相应的,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工作需要花大气力进一步推进。竞争靠什么?靠创新。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来看,创新还需迈过三道槛:第一道槛:战略的科学性和客户细分工作;第二道槛:内部流程改造;第三道槛:做好会计系统支持和相应IT信息科技的支持。

美元仍是外汇储备首要货币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11月14日在由华盛顿智库机构卡图研究所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政策“非常坚定”,未来的任何调整都必须符合经济基本面。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中比重最大的货币,因为大多数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结算交割都是以美元进行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应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实质经济交易为依据。在中国逐步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很重要,但须同其他经济改革相配合,如扩大内需和提高服务业开放程度等。人民币低估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央行在逐步提高汇率灵活性,但改革需要时间,国际收支恢复平衡也不能仅仅依靠调整汇率。

美国经济不会下滑

艾比·科恩(高盛美国首席投资策略师)11月12日在北京表示,美国经济不会衰退。美国经济能避免衰退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美国各方面经济数据都表现较为强劲,美国出口每年仍以平均8%的速度在增长,同时美国出口产品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建筑市场在2005年后下滑,但非住房建筑市场每年仍有15%的增长。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会放缓,但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较少依赖于消费者行为和住房市场,更多依赖于出口和非住房建设及企业在资产设备方面的投资。其二,美联储也有意愿推动支持经济的货币政策。在美国通胀不是问题,美联储近期对物价并不担心,因此美联储认为必要的时候会继续降息。

■ 西窗听风

“自废中医”:抛弃中华文明精华不可取

◎ 梁雨露

在国内,有人跟中医较上了劲儿,一些学者发起了一个联署废中医的活动。消息传到德国,德国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一个学术“牛人”向媒体喊话:“中医中药不能废”——此人正是领导混合疗法与自然疗法专业的教授。

西方的“独行侠”拯救东方的“江湖骗子”?中医在西方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谬矣!诚然,你很难在西方看到大型的中医院,然而,这不等于西方人不接受中医。事实上,西方人也是很乐意接受自然疗法的,越来越多的人将大量采用草药和保守疗法的中医视为一种自然疗法。

随着中西医交流的深入,以中医为招牌的诊所多了起来,以中医为主题的广告多了起来,药房里的草药多了起来,医生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地结合了中医的一些疗法。

也许,经过语言、外形以及包装等改头换面后,中医元素变得不那么容易辨认了。可是,这有什么关系

呢?对于病人来说,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最理想的选择,莫过于疗效又好又快,花钱不多痛苦小,毒副作用少。道理听起来很简单。然而,在现实中,人们还是会出现各种误判,比如,有人相信,新药的疗效一定比现有的药更好。果真如此吗?专家告诉你:新药一般会以新功能作为卖点,但采用新药的疗法是否比原来的更好,这是很难评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更贵。

但凡是药,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都需要不断地试验观察和筛选。两者最大的不同,也许是中药的试验周期更长,并且对象是病人。

西药的研制和生产,因为要考虑到成本和经济效益,必须大大加快试验周期,试验的对象,首先是小白鼠等动物,其次才是为数不多的志愿者。

出于纯粹的企业行为,制药厂会注重并强调其产品的立竿见影的疗效,如果其产品的副作用是长期的和慢性的,人们很难会归咎于某种药品的使用,制药厂也就乐得钻空子了。

说到西药的副作用,不能不提一下发生于五十年前的“一桩丑闻。康泰

克(Contergan)是一种镇定类产品,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产品,并于1957年推向市场。

然而,其始料不及的副作用,让很多服药者并没有能睡上几天好觉。在1961年和1962年期间,西德医药界爆发了一桩悲剧丑闻:人们发现,服用康泰克的孕妇们,纷纷产下了手脚不全的怪胎。在今天的德国,有两千多人中年残疾人是当初“康泰克事件”的直接受害者。

为了降低药品的副作用风险,也为了节省成本和寻找灵感,制药厂把眼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各种所谓的“生著知识”。例如,分析和提取中药的有效成份,制成受专利保护的“新药”,早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现在,国内却有声音要“自废中医”,这是一种学术性的科学辩论?还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判断?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中医也好,西医也罢,本来这都是人类获得的某种客观经验,经验性的东西需要靠经验反复检验。所以,我们既需要珍惜我们既有的中医经验,绝不该放弃继续探索中医的努力。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严复和梁启超:早期经济学翻译大家

◎ 梁捷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西学翻译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概念和名词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中文不见得会有严格对应的词语能准确译,当时许多领域里对此都有讨论,经济学也不例外。当然,严复和梁启超是早期为中国经济学翻译做出最大贡献者之一。

英文“Economy”的希腊语源是“家政学”,后来逐渐生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儒学里也有“修齐治平”的说法,与其暗暗相契。但在“重农抑商”的环境下,终究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严复不赞同不少前人用“富国策”而应该用“学”来描绘西方经济学。所以,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时,特地写了一篇“译事例言”,并作为中英名词对照表,为经济学翻译立下了一点规矩。严复用“计学”的理由是: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疑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度量经籍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包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梁启超是严复的好友,但他不太同意严复的这个译名,觉得“计学”有些不便,也许更传统的“生计”更合适。他以日本人的研究资料为基础写过一本《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比严复的《原富》还早一年。

“计学”之名,今尚未定。本偏向用“平准”二字,似未安。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用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今姑用之,以俟后人。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

两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共识。比如,他们都赞成把“资本”翻译成“母财”,取其“以财生财,众财之母”的意思,与后来从日本流入的“资本”概念各有意味。而且,严、梁二人都有意宣扬中国古书中一些词,以区别于日本人的翻译。“租、庸、息”这三个名词的翻译最有代表性,梁启超说,租、庸和息三者,物价之原质也。理解了这几个概念,也就能顺利地把握整个西方经济学的脉络。

例如,第一个词是“租”。劳力者必资土地乃能产物,而土地既非所自有,遂不得不纳租赋以乞贯之于地主,分其劳力所得之若干以为偿,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谓之地代。”这个词后来在经济学翻译中被保留下来,主要指地租,没有使用日本的“地代”。

还有,另一个词“息”。梁启超说道,“积聚者出其母财以资材焉,以资材焉,及其成货也,又不得不分其劳力所得之若干以为偿,若是者谓之息。日本谓之利润。”后来,这个词在产业经济中慢慢被废置了,但“利息”这个词在货币经济中却被保留了下来。仔细体会“利润”与“利息”的区别,对于经济学初学者都是极好一课。

此外,两人在译介时还各显才能,颇多创造,显示出严复和梁启超在西学翻译上的高超技巧。

在翻译上,梁启超颇多神来之笔。比如,他巧妙借用佛典,把莫尔的名著《乌托邦》译为《华严界》,译名颇为妥贴。还有,梁启超把今日统称为“重农学派”译为“性法理学”,并把魁奈的《经济表》译为《性法论》。从Physiocrat School”的词源学考察来看,“性法理学”似乎比“重农学派”更为贴切。因为,尽管重农学派学论述论偏重农本,但重农只是一种表象,尊重自然规律才是这个学派的根本理念。更何况,梁启超还认识到了这一学派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性法亦谓之天然法律(即自然法),即政治家所谓天赋人权说也。这层含义是今天我们使用“重农学派”时所无法体现的。

严复从事教育,梁启超走向媒体,两人在翻译传播上的影响都很大。李鸿章等人一直关注西学翻译的工作,他与盛宣怀认为,“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故请来张元济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张元济与严复往来甚密,两人详细商量了翻译的规范化问题后,一一着手落实。《原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严复与译书院商定,要对翻译中的具体度量衡等应有固定译名,以免各译其名,同名异译,使读者读后如坠五里云中,不知所云。

《原富》出版以后,影响非常大,第一次给中国人带来了平实而又深刻的西方经济学理念,严复的名字就这样被人记住了,但严复创造的那么多翻译名词却多半没有流传下去。这可能是严复的翻译直接与中国传统相连接,但这一传统在上世纪初却发生了断裂。科举废除、民国建立和新文化运动等一次次冲击,使得接受新学的青年人更愿意直接使用日文翻译,也可惜了严复的一片苦心。

现在,当我们再来咀嚼租、庸、生货、熟货等概念时,除了反思那一代中国人接受西学时的心路历程外,感受更多的是一丝丝传统的温情。